让世界同唱中国歌
——姚锦新与《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

宫宏宇

摘　要：《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是姚锦新与前夫陈世骧合作的英文中国歌集，也是她一生中唯一出版的作品。虽然此歌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颇有影响，但国内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本文拟通过稽查文献、搜罗海外有关的研究来对这歌集之产生及影响做一描述。钩沉《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之出版史实除遥寄对姚锦新的思念外，还旨在凸显姚先生在中西音乐交流上所做的尝试。

关键词：姚锦新；陈世骧；《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赛珍珠；考威尔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71（2010）04－0064－08

引　言

1951年就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一直到1964年才调任中国音乐学院的姚锦新教授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做过很多贡献。可是，从她1992年6月11日逝世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近二十年，此间国内音乐界除有廖辅叔写有《大才未展、懿范长存——哀悼姚锦新教授》［1］和李西安《学业的导师　为人的楷模——女音乐教育家姚锦新》（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2期，后收入向延生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2卷［2］）的回忆文章外，有关姚锦新的专题研究几乎没有。有趣的是，坊间近年来对她的传奇人生却颇感兴趣，这其中的原因或是因她与乔冠华的一段恋情（如吴妙发1994年撰写的《飘逝的风筝，遥远的爱——乔冠华与钢琴家姚锦新的一段恋情》，宗道一《钢琴家姚锦新与乔冠华的一段恋情》［3］、茆贵鸣著的《乔冠华传：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4］等），或是源于她是中国共产党要人姚依林的姐姐［5］。姚锦新的音乐人生只是其中的点缀。姚锦新一生学多识广，在德国和美国都留学工作过，先后就读的学校包括柏林高等音乐学校、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师从的名师我们知道的就有作曲家、钢琴家理查德·罗施乐（Richard Rössler，1880－1962）、丽迪亚·伦茨（Lydia Lenz），作曲家保罗·兴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1898－1962）、查尔斯·库兴（Charles Cushing，1905－1982）、罗杰·塞欣斯（Roger Sessions，1896－1985），此外，她与比较音乐学家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等也有接触。1947年秋回国后，她又认真学习研究过苏联的音乐体系和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秦腔。但遗憾的是，如李西安先生所说，“姚锦新有非常渊博的学识，在学术上却‘述而不作’”［2］（第166页）。与姚先生私交甚笃的廖辅叔在盛赞她“大才”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她“出版的作品只有一本《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1］（第155页）。但就是这部用英文写作的出版于异域的早期著作却给姚先生带来了不少的烦恼。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在何种情形下出版的？姚锦新通过此书所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此书问世后读者是如何反应的？与同时期出版的类似著述比较此书有何特色？将近七十年过去了，此书除了历史意义外是否还有别的值得参考的地方？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收稿日期：2010－08－30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哲学博士，现在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任教。

需要声明的是，有关《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的作者、出版过程、时代背景以及此歌集美国音乐发展史上的意义，珍妮弗·塔利（Jennifer Talley）在2009年提交给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学院的硕士论文中已有较全面深入的阐述［6］，本文中所陈述之事实，除了直接取自《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一书外，其背景材料多得益于塔利之论文[①]。但遗憾的是，塔利之论文对《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的主要作者姚锦新的生平及业绩着笔甚少，对她离开美国后的情况更是全然无知。或许是由于语言的原因，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廖辅叔、李西安曾就姚回国后的经历写过回忆文章。

一、《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其书

《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The Flower Drum and Other Chinese Songs*）（以下简称《花鼓》）［7］是姚锦新与其前夫、著名旅美学者陈世骧（Shih-hsing Chen，1912－1971）改编配乐的一本中国歌集，开本尺寸长29厘米，宽23厘米，有5幅插图，1幅照片，谱例17首，共64页。1943年在美国纽约市由约翰·戴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见图1），分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书的正文前有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和亨利·考威尔（Henry Cowell，1897－1965）写的“绪言”和“序言”各一篇，还有陈世骧和姚锦新（书中按旧例以“陈姚锦新”署名）各自作的简短的“导言”。正文部分共有古今歌曲17首，分为五部分，分别题为：1.“花鼓歌”；2.“江南”；3.“古都内外”；4.“爱情与自然之歌”；5.“当代歌曲”。

赛珍珠和考威尔的“绪言”和“序言”虽然短，但均值得细读。以写中国题材而获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音乐上虽算不上行家，但由于她出生在中国，从小说汉语，而且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因而她对中国音乐的了解不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换句话说，她是通过在中国阿妈的怀抱中倾听摇篮曲、和中国小朋友玩耍时一起唱儿歌、听仆人们休憩时唱小曲、和家人去逛庙会等方式而接触到中国音乐的，她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音乐的理解自然要比一般的外国人深得多。她直觉地感到用西方古典的和声配中国的歌曲无异于缘木求鱼。在为《花鼓》所撰的“绪言”里，她除了泛泛谈到中国人与音乐外，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用她自己的话说：“西方意义上的和声化只会毁掉中国歌曲（Harmonization in the western sense destroys the songs）。”此外，她还特别提到《花鼓》一书有三个“突出的优点”（outstanding merits）——歌曲本身、姚锦新的钢琴伴奏、陈世骧的歌词翻译。姚锦新的钢琴伴奏之所以被她夸赞，也正是因为姚锦新一反常人的做法，没有用西方的和声，而是用自己“超凡绝伦的手法”（extraordinary means）创作出了一套适合中国音乐的伴奏手法。她采用的是钢琴，但所创作出的却是“笛子、鼓、琵琶、二胡等其他中国乡村老百姓用来伴歌的乐器”的效果［7］

图1.



THE FLOWER DRUM PLAYERS FROM FENG-YANG

by Ku Chien-lung (c. 1606-1686), shows the Feng-yang couple in country attire, performing in a rich man's garden. The woman beats her flower drum. The man strikes a small gong. Plum blossoms behind the artificial rocks indicate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Chinese lunar year.

Courtesy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The

Flower Drum

and Other Chinese Songs

CHIN-HSIN YAO CHEN and SHIH-HSIANG CHEN

Foreword by PEARL S. BUCK　　Preface by HENRY COWELL

Illustrated

THE JOHN DAY COMPANY · NEW YORK

（第 5 页）。

“在音乐上独辟蹊径”也是美国先锋艺术早期的领军人物考威尔对姚锦新的评语。在为《花鼓》所撰的“序言”中，考威尔和赛珍珠一样，首先表示了对西方世界中为迎合西方听众的趣味不惜对中国旋律胡编乱配的做法的极其厌恶之情。他说：“对中国音乐我们的音乐家所知极少，充其量只能做些印象层面的‘假东方’（“pseudo-oriental”）式的背景性的东西。”但他对唯西方音乐马首是瞻的中国的音乐家也颇有微言，认为他们太过迷恋简单的和弦以致于“把自己本土的旋律配以路德赞美诗式的和声”。“我一直觉得——有时甚至公开主张——用钢琴令人满意地为中国旋律配乐是件不大可能的事，因为中国旋律充满了曲线和装饰音，而钢琴在音上却是一刀切的。陈太太［姚锦新］用她的钢琴伴奏证明了我是彻头彻尾的错了。通过采用简单的对位手法和开放式的音程，陈太太以真正的中国乐器伴唱的风格，让钢琴加些装饰音随着旋律进行。”考威尔最后的评语是“此书是我所知的对西方人来说最好的中国民间音乐风格和魅力的入门书”［7］（第 6 页）。曾培养了凯奇（John Cage，1912 – 1992）、格什温（George Gershwin，1898 – 1937）等著名作曲家的考威尔[②]不仅是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作曲家，他也是美国最早提出走出欧洲音乐传统、拥抱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音乐理论家。对东亚的音乐，他更是表现出了浓郁的兴趣。他甚至认为“日本和中国音乐是美国音乐的一部分”（转引自［8］第 119 页）。他对姚锦新的赞誉并非仅仅是客气之言。与一般的喜欢猎奇的外国人不同，出生在旧金山，并在旧金山唐人街和日本人社区长大的考威尔对东方音乐从小就耳濡目染［9］（第 625 页）、［8］（第 120 – 122 页）。与中国和日本孩童一起嬉戏玩耍、去唐人街听戏是他小时候常做的事。对考威尔颇有研究的学者饶韵华甚至认为中国音乐也是考威尔的“音乐遗产”［8］。[③]姚锦新在《花鼓》中弃传统的功能性和声不用，而“尝试着用中国的支声复调手法为民歌和词调配伴奏”的做法［2］（第 165 页）的确令当时的作曲家耳目一新。事实上，不仅仅是考威尔对姚锦新的伴奏写法表示赞赏，就连法国作曲家米约也称赞这本书“充满了中国的配器法”［1］（第 157 页）。

如果说赛珍珠和考威尔的恭维之词多少得力于出版商的刻意安排的话，钢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亨利·珀蒙特·伊姆思（Henry Purmont Eames，1872 – 1950）[④]刊登在《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45 年 8 月号书评［10］中的溢美之词则出于他对《花鼓》由衷的喜爱。当时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学院研究生院（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任教的伊姆思称赞《花鼓》中的音乐易于为所设定的西方听众所理解，无论是清唱还是在钢琴上弹奏都可使人得到极大的享受。为此，他不仅特地举出了他自己家人老少同唱的例子［10］（第 399 页），还预言“所有喜爱民间音乐的人都会欢迎此书中的歌曲”［10］（第 398 页）。显然他对姚锦新的学术背景有所了解，他认为姚锦新为《花鼓》配乐是有其独特资格的，因为她“既有东西方文化的审美知识，又具备了东西方音乐的实际技能”［10］（第 398 页）。对全球范围的歌咏运动极为关注的伊姆思虽然对陈世骧朴实无华的翻译颇多赞誉，但作为钢琴家的他自然对姚锦新写的钢琴伴奏倍加注意[⑤]。和赛珍珠、考威尔、米约一样，他也对姚锦新不落俗套的配乐手法赞不绝口。特别是在融合东西方民间情感上，他认为《花鼓》比他所见过的任何类似的出版物都更令人满意。他指出姚锦新“对不同种族间音乐的融合也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通过在钢琴伴奏部分巧妙地运用自由式和非连贯性的对位手法，她避免了不伦不类的组合”。和赛珍珠、考威尔一样，伊姆思也指出把西方和声体系生搬硬套地强加给非西方音乐的不可行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和弦、四部和声、小节线、节拍速度制约着西方音乐。在我们西方的节奏和音体系中它们是必要的也是基本的。但如果用西方的和声体系迫使亚洲的音乐模式就范，大多数亚洲单音歌调的流动的、线性的美就大多会被肢解或（套用希特勒的话）‘被清洗’掉。”他这样说并非只是泛泛而谈，而是出自他多年来悉心研究美国印第安民歌的心得。对他来说，把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用另一个民族的音乐形式来表达而又不改变其内在的意义和给人的特有的感受是不可能的。但使他叹为观止的是，姚锦新却出乎意料地做到了他认为不可能的事：“在她为可爱的‘啥花开来’和‘离情’所配的乐中，陈太太给我们展示了两种音乐思维体系是如何可以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的。”更使他欣喜的是，姚锦新的钢琴伴奏不仅做到了“形似”，而且做到了“神似”。他不无感慨地说：“在‘孟姜女’、‘花鼓歌（第二首）’、‘探亲家’以及别的歌曲中，不仅民间音乐美的新鲜的层面被展现开来，那种让人琢磨不定的、通常被人称为‘东方风格’的特质也被她捕捉到了。”［10］（第 398 页）

值得注意的是，《花鼓》并不是 20 世纪 40 年

代中期在美国出版的唯一的英文中国歌集。因为当时先后在纽约出版的至少还有李抱忱编辑的《奋战中的中国的歌曲》（*Songs of Fighting China*）［11］和葛星丽（Stella Marie Graves）[⑥]的《闽江船歌》（*Min River Boat Songs*）［12］，后者还和《花鼓》一样，同样由约翰·戴公司出版。但《花鼓》无论是在编者、选材上，还是在编辑旨意、编排体例上都与上述两本歌集有着明显的不同。1944 年出版的《奋战中的中国的歌曲》是李抱忱（1907－1979）在其 1939 年香港版和加尔各答版《中国的爱国者高歌》（*China's Patriots Sing*）11 首抗战歌曲的基础上，“增补了 1939 年以来广泛传唱的 10 首歌曲”而成的［13］。《闽江船歌》则完全是以福建闽江船工号子曲调为素材的 10 首创作歌曲。前者是李抱忱“应中央宣传部之请”而编撰的，是一本“为国际宣传的抗战歌曲集”［13］；后者则是曾任金陵女子大学音乐教授的葛星丽根据美国汉学家马尔卡姆·法雷（Malcolm F. Farley，1896－1941）所采集的闽江船工号子曲调改编创作的。

很显然，姚锦新、陈世骧二人是要把中国音乐艺苑掇英式地介绍给西方听众。在所选歌曲的种类上，《花鼓》中既有世代传承的民间乐舞，也有城市流行的小曲；既有古代文人吟诵的词乐，也包括抗战时的创作歌曲。在所选歌曲的流传地域上，有出自安徽北部的凤阳花鼓，也有遍传华夏的老八板；有江南独有的方言情歌，也有北方流传的“小白菜”。其中“花鼓歌”部分包括选自 1772 年刊行的安徽“凤阳花鼓”两首；“江南”部分除一首江南版的、悲哀的歌调“孟姜女哭长城”外，还收有欢快的、用苏州方言唱的对话式的情歌“啥花开来”和茶楼酒肆中歌女为客人演唱的小曲“无锡景”两首。在“古都内外”部分，作者把目光转向华北，所收的是北京城内和京畿附近流行的民歌。这些民歌可能最初来自全国各地，但在北京地区颇为流行，如河北民歌“小白菜”、源自民间乐曲“老八板”的歌曲“小和尚”、来自民间歌舞剧的“探亲家”、用作摇篮曲的“紫竹调”。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还收有代表道教音乐特点的“板桥道情”一曲，词选自郑板桥的诗，曲调选自明代程明善辑 1622 年所刊的《啸余谱》中的道情曲。“爱情与自然之歌”部分表现的是中国文人的词乐，收有明清文人用“眼儿媚”和“行香子”曲牌填词的“晚景”、“离情”和传统的闺帏相思曲“中秋闺怨”、“春讯”共四首。“当代歌曲”部分把目光转向 20 世纪的中国乐坛，选有黎锦晖二十年代初期创作的儿童歌曲“可怜的秋香”、陶行知填词的大众劳动歌曲“锄头歌”、抗日战争时期由老舍作词，张曙作曲的战争歌曲“丈夫去当兵”。

在销售上，《花鼓》也颇有鳌头独占之势。塔利通过研究现保存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戴公司的销售记录和读者反应等资料表明，《花鼓》的销售情况相当不错，书上市后不久就在美国本土售出了精装本 757 本、平装本 241 本。加上在加拿大和亚洲各地售出的精装本和平装本，11 周内共售出 1071 本［6］（第 36 页）。这期间姚、陈夫妇和约翰·戴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收到了各种各样公司的来信，希望在学校教科书中或电影中用他们的歌曲。《花鼓》出版后，姚、陈夫妇还通过在加州各地举办讲座、现场展示等多种方式推销此书。即使是 1947 年姚锦新回国后，此书还在销售，至少直到 1950 年还有出售［6］（第 36－37 页）。约翰·戴公司的档案资料还显示，《花鼓》中的歌曲不仅在加州被用来在募捐音乐会上演唱，其中的一首歌曲还被用作电影插曲［6］（第 63 页）。《花鼓》的流传范围也很广，就连地处新西兰南岛最南端的奥塔歌大学也存有此书，笔者所研究的版本即来自该校图书馆。

二、《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受欢迎之原因

《花鼓》之所以一出版后就广为流传，除了此书姚锦新配曲有方和陈世骧翻译地道外，还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花鼓》出版时的美国的政治气候及民心所向；二、约翰·戴公司为《花鼓》一书所做的努力；三、陈世骧、姚锦新夫妇的社交圈。

《花鼓》的备受欢迎首先是与美国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态度的改变有关。用 1949 年前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罗伊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在其《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中的话讲，1937 年到 1944 年恰好是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由“仁慈”（benevolence）转向“景仰”（admiration）的时代［14］（第 71 页）[⑦]。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被迫卷入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军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随之突变。《花鼓》1943 年的出版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皆占。

其次，选对出版社以及出版商的客观努力也是《花鼓》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出版该歌集的约翰·戴公司成立于 1926 年，1927 年被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作家、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 1889 – 1955）接管。沃尔什是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15］（第112 页）。1935 年赛珍珠与沃尔什结婚后，也进入该公司当编辑。由于该公司以出版远东书籍为主（沃尔什还是《亚细亚》杂志的主编），二战期间成为出版远东书籍的大出版社之一。芝加哥大学汉学教授顾立雅（H. G. Cree，1905 – 1994）的《孔子——其人及其神话》（*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一书，就是此公司出版的。赛珍珠的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和林语堂的很多英文畅销书（如《吾国吾民》《啼笑皆非》《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生活的艺术》等）也都是这个公司出版的。姚锦新和陈世骧是在 1941 – 1942 年间结识赛珍珠和沃尔什的［6］（第 25 – 26 页）。赛珍珠夫妇和其所属的约翰·戴公司的确为《花鼓》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事无巨细（从编辑的细节到字体的采用、从汉字的排版到成书后的市场营销、从封面的设计到插图的选择、从广告词的编撰到书评的组织）都经过了无微不至的安排，务求万无一失［6］（第 27 – 31 页）。约翰·戴公司对《花鼓》之上心，从以下一个细节就可窥见一斑。在约翰·戴公司内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公司的职员密欧思（Harriet Mills）小姐被告知一定不要忘了与舆论界联系。特别提到的大牌音乐评论员除了《旧金山新闻》的阿尔夫雷德·弗兰肯斯坦（Alfred Frankenstein，1906 – 1981）、《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1896 – 1989）、《纽约时报》的霍华德·陶布曼（Howard Taubman，1907 – 1996）外，还有《现代音乐》杂志的编辑科林·麦克菲（Colin McPhee，1900 – 1964）。备忘录中特别强调，这些人的名字都应加到公司固定的乐评者名单上［6］（第 31 – 32 页）。汤姆森和弗兰肯斯坦也没有辜负出版商的厚望。素以语言尖刻著称的汤姆森不但夸陈世骧翻译的歌词地道，还特别指出姚锦新的自由式钢琴伴奏“比用古典句法写成的现代中国音乐听上去更像古典中国音乐”。弗兰肯斯坦对《花鼓》也同样深表赞赏，在《旧金山新闻》1943 年 12 月 19 日的“音乐世界”栏目中，他热情地介绍说：“《花鼓》虽然只有 17 首歌，但在选择和编排上却极其讲究，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很小巧但［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歌的切面图（a very tiny cross section of Chinese folk song）。”对陈世骧写的简短的解说词，他也不忘夸上几句。说它们“极具启发性”，“对每一首歌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总之，在他眼里《花鼓》“是一本魅力十足、学术上值得注意、且在创作上具有极高想象力的书”（转引自［6］，第 32 页）。

第三、《花鼓》的成功与陈世骧、姚锦新夫妇的人脉也是密不可分的。从为此书作序的人和陈姚二人各自鸣谢中所提到的名字来看，陈世骧、姚锦新夫妇的社交圈非常广，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地区。文学界的朋友除大家都熟知的小说家赛珍珠和她的作家、编辑、出版商丈夫外，还有美国著名诗人约翰·霍尔·维洛克（John Hall Wheelock，1886 – 1978）和爱尔兰诗人培德莱克·科拉姆（Padraic Collum，1881 – 1972）。陈世骧在哥伦比亚和哈佛大学任教时，结识了分别在两校任教的科拉姆和维洛克。陈世骧特别感谢这两位诗人在汉诗英译上给他的实际帮助，“丈夫去当兵”歌词的翻译甚至就是在维洛克的家中和维洛克夫妇及科拉姆一起完成的［7］（第 8 页）。陈世骧、姚锦新夫妇音乐界的朋友也很多，考威尔、塞欣斯以外，与《花鼓》直接有关的就有美国音乐学家、教育家、作曲家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1886 – 1979）、他的第二任妻子、作曲家鲁斯·克劳福德（Ruth Seeger，1901 – 1953）、法国作曲家、指挥家、著名音乐教育家纳迪亚·布朗热（Nadia Boulanger，1887 – 1979）、俄裔美国作曲家哈里森·克尔（Harrison Kerr，1897 – 1978）、共产党作曲家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1898 – 1962）和朱莉娅特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格拉迪斯·梅约（Gladys Mayo，1894 – 1977）。在姚锦新的“导言”中，她特地提到艾斯勒、布朗热、考威尔、西格夫妇、刘良模、科尔等在音乐上为她提供的建议［7］（第 7 – 9 页）。

三、《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的历史意义

有学者说，李抱忱的《中国抗战歌曲集》“是我国第一本向海外人士展示中国抗战音乐文化特色的歌曲集”［13］。在“如实反映当时‘广大的民众都在唱些什么歌’的‘国际宣传’作用上”，李抱忱的歌集的确“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13］。但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用英文在美国出版的姚锦新、陈世骧的《花鼓》不仅也像《中国抗战歌曲集》那样“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宣传了抗战，也向国外读者展示了中国作曲家的‘群体形象’”［13］，更重要的是，它在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性、多样性的同时也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创新性和中西音乐融合发展的可行性。《中国抗战歌曲集》虽然有其艺术性，但毕竟是李抱忱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之请主编的“一本为国际宣传的抗战歌曲集”［13］。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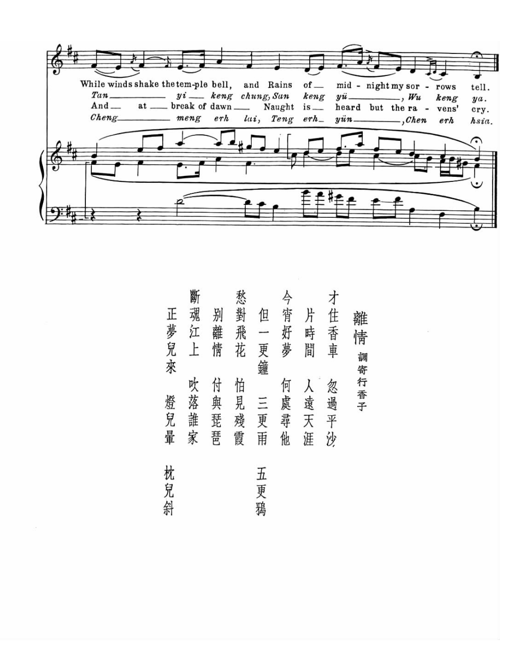
《花鼓》则不然，《花鼓》虽有弘扬中华音乐艺术之旨意，但其出版却并非只为宣传抗战。也正是由于它本身的艺术成就，《花鼓》才能够“被美国音乐学家认定为当时能最准确地把中国音乐呈现给美国听众的书籍之一”［6］（第 63 页）。作为“最早为美国听众和西方乐器现实地再现中国传统音乐的英文歌集之一”，《花鼓》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通过对比同时期出版的类似歌集，塔利得出了“在 1940 年或之前，我还没有发现任何别的中国民歌集像陈太太在她所创作的伴奏中那样忠实地试图重构中国音乐”的结论［6］（第 61 页）。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花鼓》不仅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音乐，在美国的音乐发展史上似乎也有一定的地位。塔利在其硕士论文的“结论”中就认定《花鼓》在美国音乐史上“扮演了值得注意的角色 ”［6］（第 63 页）。她甚至以“一本美国歌集？——陈世骧、姚锦新《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分析”为其论文命名。以往在西方出版的大多数中国民歌集，或出自来华传教士之手，或出自对音乐有兴趣的来华游客，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音乐却几乎没有掌握多少“话语权”。而《花鼓》不仅仅完全出自中国人之手，而且是出自两个受过中、西方高等教育的、专业的中国人士之手。陈世骧[8]是公认的比较文学家、翻译家［16］［17］。他也是诗人和诗学家，早在 1936 年就与艾克敦（Harold Action，1904 – 1994）合译了被世人公认为第一部英译现代中国诗集《中国现代诗选》［18］。他在中西诗学研究的成就至今仍有人研究［19］。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王德威在近期发表的一篇长文中甚至以陈世骧、沈从文（1902 – 1988）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 – 1980）“为坐标”来论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20］（第 80 页）。与中西学问俱佳且颇有诗人气质的陈世骧相比，出生在上海官宦世家的姚锦新似乎更偏重西学。她从小就浸淫西乐，在就读传教士办的崇真女学、中西女塾时钢琴已弹得不错。上清华大学时又从政治学转入西语系，最终放弃外语而专攻钢琴。1932 年赴德后，又入柏林高等音乐学院深造。姚锦新不仅钢琴弹得好，对现代作曲技法也深有研究［1］［2］。在美国，她除了追随艾斯勒、库兴、塞欣斯学习现代作曲法和作品分析外，在编配《花鼓》时又得到了艾斯勒、西格夫妇、布朗热、梅约等人的鼓励和实际帮助［7］（第 9 页）。陈、姚夫妇的珠联璧合的合作自然要比“请了几位英国和美国朋友共同”“将歌词译为能唱的英文歌词”的做法［13］要好得多。

《花鼓》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所显示的一个学科发展的趋向。当时在美国出版的绝大多数中国歌集都是只把记下来的民歌旋律配上西方人熟悉且可以理解的伴奏，对民歌的起源、传承、地域特征、表现形式等音乐外的背景资料大都很少瞩目［6］（第 61 – 62 页）。和一般的歌集不同，《花鼓》的每一部分都有有关曲目文化背景的简介。书中的每首歌曲不但都有声乐和钢琴声部，歌词部分也均由英文翻译、歌词汉语音译和汉字三部分组成（见图 2）。

图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花鼓》一书的各节前，陈世骧以其文史专家的特长不仅对节中所含歌曲的历史背景、文化特征、流传区域、演变过程等都有简单扼要的介绍，还选有多幅有中国特色的插图。如在“江南”一节介绍“孟姜女”时，他除了介绍孟姜女与长城的故事、民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各地的孟姜女碑文、孟姜女庙、孟姜女曲调的不同变种外，对史书中有关孟姜女的记载、西文中有关孟姜女的著述也做了简单的交待，最后还附上了一幅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出自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孟姜女哭长城木刻插图［7］（第 16－17 页）。在“当代歌曲”一节，姚锦新、陈世骧不仅介绍了当时中国音乐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列举了赵元任、黄自、萧友梅、程懋筠、梅兰芳、程砚秋、黎锦晖、聂耳、刘良模的业绩，还附上了 1937 年刘良模在绥远指挥一万名士兵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照片。在当时的美国，由于德国比较音乐学家的到来，在大学任教的音乐学家已不满足于对音乐本身的理解，而是努力在研究音乐的同时对其文化也予以关注。《花鼓》的出版与这一刚刚兴起的注重文化背景的趋向不谋而合。虽说民族音乐学（也称音乐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还没有确立，但对其他非西方音乐文化的关注已在美国音乐学初露端倪。当然，姚、陈夫妇这样做是否是有意识的还尚难做定论，但他们与这一趋向主要倡导者（考威尔、西格夫妇）的交往却是不争的事实。塔利还特别指出姚锦新来美前在德国留学的史实，并通过指出音乐学在二战前德国的发展来推测姚、陈夫妇注重音乐文化背景的原因［6］（第 62 页）。《花鼓》的出版无疑为美国音乐学界了解教授中国音乐提供了教材［6］（第 62 页）。廖辅叔先生就提到“美籍德国音乐学家，又是乐器学权威库特·萨克斯对《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是那么喜欢，以致他把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给他的好友每人一本”［1］（第 157－158 页）。

结　语

以上就《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的出版过程、时代背景、读者反应以及此歌集美国音乐发展史上的意义以姚锦新为中心进行了简单的综述。鉴于篇幅的原因，本文未能在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语境下就《花鼓》展开讨论。对姚锦新在《花鼓》一书中展现的创作手法，也因塔利在其论文中［6］（第 45－59 页）已有较详细的分析，所以没有再赘述。廖辅叔先生在多年前悼念姚锦新教授的文章中曾发出“人琴俱亡”的哀叹，本文籍中央音乐学院建院 70 周年之际，通过钩沉《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之出版史实来告慰廖老。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姚锦新人虽已逝去，但其业绩并未被历史遗忘——至少在大洋彼岸的异邦。

---

① 塔利的论文不长，仅由五章组成，共 73 页。除第一章引言与第五章结语外，有正文三章。第一章介绍《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论文研究所用资料、论文结构组织。第二章通过赛珍珠的《大地》、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阴险狡诈的傅满洲博士》和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陈查理探案》系列小说来概述 1845－1940 年间中美关系和美国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题为“机会与关系：陈氏夫妇与他们的歌集”的第三章，是整篇论文的核心，也是最值得参考的一章。此章除介绍陈世骧、姚锦新的生平、学术背景以及他们的社交圈子外，对出版《花鼓》的约翰·戴出版公司也着笔甚多。此章的长处是对保存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戴公司档案的充分利用，不足之处是对姚锦新的生平的叙述太过简略。除了提到她在德国留过学以及她在加利福尼亚时的情况外，作者完全没有参考到国内学者有关姚锦新生平的叙述。第四章主要分析《花鼓》中的音乐，具体分析“凤阳花鼓”和“离情”两首歌曲。此外，把《花鼓》与同时期出版的其他两部歌集相比较，也是此章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五章为结语，重点是重估《花鼓》的重要性。

② 关于考威尔（也有人译为考埃尔）在美国现代音乐史上的贡献，可参见蔡良玉《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简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第 201－207 页。

③ 关于考威尔与中国音乐，饶韵华（Nancy Yunhwa Rao）的这篇论文也很值得参考：“Cowell's Sliding Tone and the American Ultramodernist Tradition”, *American Music*, Vol. 23, No. 3（2005）, pp. 281－323.

④ 亨利·伊姆思 1872 年生于芝加哥，虽从 12 岁时起就学习音乐，但他在西北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法律。1898 年到 1908 年曾在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音乐学院任教。之后他去欧洲，先是巴黎开办私立音乐室，后又法国和英国巡回演出。1911 年回到内布拉斯加后，任奥马哈音乐和应用艺术学院总管。1912 年他移居加利福尼亚州后，在克莱蒙特学院任音乐与美学教授。他曾和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哈特利·伯尔·亚历山大（Harley Burr Alexander，1873－1939）有过合作，创作过歌曲、电影音乐，对美国印第安人音乐也发表有过研究论文。以上资料来自：（1）. Edward Ellsworth Hipsher, *American Opera and Its Composers*（Philadelphia: Theodore Presser Co. 1934）, pp. 165－166;（2）. http://www.lincolnlibraries.org/DEPTS/polley/Authors_ Catalog.htm#E

⑤伊姆思曾随舒曼的夫人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1819－1896）、波兰作曲家、钢琴家伊格内西·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1941）、德国钢琴家克瓦斯特（James Kwast，1852－1927）等多位名师学过钢琴。

⑥ 葛星丽还就中国音乐教育发表过论文（“Music Education in China”,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Vol. 33, No. 1 (1946), pp. 26 – 27; 59 – 61），还和费佩德（Robert F. Fitch）、杨荫浏选编有《教会周年颂神歌咏》（上海：广学会，1939）。法雷除记录有数百首船歌外，还曾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上发表过历史方面的论文。如“Some Mirrors of Supposed Pre – Han D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 No. 1 (Jan., 1940), pp. 72 – 94.

⑦ 此书中有关中国部分国内已有陆日宇、于殿利译本，见《美国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⑧ 书香门第之家出生的陈世骧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与卞之琳、赵元任、何其芳等很多现代诗人均有过来往，也曾在北大和湖南大学任过讲师。除现代诗外，他还翻译过陆机的《文赋》、孔尚任的《桃花扇》等，出版过《作为文化本体的中国文学》等。1941 年赴美后，先后在哥伦比亚、哈佛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伯克莱的中西文学比较课程就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陈世骧虽然于 1971 年心脏病突发早逝，但他教过的学生却仍活跃在学界和文坛。如第一位将《牡丹亭》全本翻译成英文的英籍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和著名台湾诗人杨牧（原名王靖献，1940 ~）就是他的学生。

参考文献：

［1］廖辅叔．大才未展、懿范长存——哀悼姚锦新教授［A］．廖崇向编．乐苑谈往——廖辅叔文集［C］．北京：华乐出版社，1996.

［2］李西安．学业的导师、为人的楷模——女音乐教育家姚锦新［A］．向延生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 2 卷）［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3］宗道一．钢琴家姚锦新与乔冠华的一段恋情［J］．石家庄：文史精华，2000，（11）：21 – 25.

［4］茆贵鸣．乔冠华传——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5］水新营，支锐．姚依林的早年岁月和他的大家族［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0313886.html（2010 年 8 月 8 日登陆）

［6］Talley, Jennifer. “An American Song Book?: An Analysis of *The Flower Drum And Other Chinese Songs* By Chin-Hsin Chen And Shih-HsiangChen” ［D］. MM Thesi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2010.

［7］Chen, Chin-Hsin Yao, and Shih-Hsiang Chen. *The Flower Drum and Other Chinese Songs* ［C］. New York: John Day, 1943.

［8］Rao, Nancy Yunhwa. “Henry Cowell and His Chinese Music Heritage: Theory of Sliding Tone and His Orchestral Work of 1953 – 1965” ［A］. in *Locating East Asia in Western Art Music*, ed. Yayoi U. Everett and Frederick Lau (Wesleya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9 – 145.

［9］Rao, Nancy Yunhwa. American Compositional Theory in the 1930s: Scale and Exoticism in ‘The Nature of Melody’ by Henry Cowell ［J］. *The Musical Quarterly*, Vol. 85, No. 4 (Winter, 2001), pp. 595 – 640.

［10］Eames, Henry Purmont. “Review of *The Flower Drum and Other Chinese* 67 *Songs* by Chih-Hsin Yao Chen and Shih-Hsiang Chen” ［R］.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4/4 (August 1945): 398 – 399.

［11］Lee, Pao-Ch'en. *Songs of Fighting China* ［C］. New York: Chinese News Service, 1943.

［12］Graves, Stella Marie and Malcolm F. Farley. *Min River Boat Songs*. Tunes Collected by Malcolm F. Farley. ［C］. New York: John Day, 1946.

［13］曲文静．中国近代合唱事业的先驱——音乐家李抱忱百年诞辰纪念［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4）：41 – 48.

［14］Isaacs, Harold Robert. *Scratches on Our Mind: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M］. New York, John Day, 1958.

［15］Conn, Peter. *Pearl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6.

［16］Birch, Cyril. “Obituary: Shih-Hsiang Chen, April 23rd, 1912 – May 23rd 1971”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1/4 (1971): 570.

［17］Birch, Cyril, ed.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18］Bian Dongbo. “Muse Travels Far Away: The First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Translated for the West” ［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May 1, 2010): 1 – 20.

［19］徐志啸．比较视野中的中西诗学——美籍学者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3 – 60.

［20］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J］．中国文哲研究集刊，33. 2008：77 – 137.

（责任编辑：王　璐）